

# 《禹贡》“大别”地望之争的历史考察

沈志富

(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安徽安庆 246011)

**【摘要】**《禹贡》所载“大别”地望近两千年的名实之辩至清代最为激烈,形成“汉阳”说和“安丰”说两大主流。两说分始汉、唐时期,最早见诸《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汉晋时人多主“安丰”说;汉唐间杜预、郦道元注经献疑,分歧渐起,至唐人李吉甫提出“汉阳”说;宋明因之,渐取代旧说;复至清儒诸家论说打开新一轮“大别”地望之辩。中古以来“大别”地望的几度变迁,既受书写者观察视角和地名知识来源差异的影响,也体现了地理志书与经学传注间的信息互动及其调适。

**【关键词】**《禹贡》 大别山 地望之争 安丰 汉阳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822(2025)03-0023-14

《禹贡》所载山川地理一直是古今学术焦点之一,清代四库馆臣认为:“宋以来所聚讼者,莫过《禹贡》之山川。”<sup>①</sup>争议较大、研究较多的如九江、三江、九河、黑水、衡山、太行等,学者多从经学、史学、沿革地理等视域探讨其地望演变及知识传播过程。<sup>②</sup>相较而言,“大别”地望争议持续时间久、情形复杂,也有一定典型性,但近世尚无专题研究。<sup>③</sup>

“大别”是上古名山,先秦经典中曾三次出现。首见《左传·定公四年》,言吴楚两国交战,

---

[收稿日期] 2023-12-27 doi: 10.20166/j.issn.2096-6822.L20230436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民间文献与大别山区历史地理专题研究”(AHSKF2019D065)

[作者简介] 沈志富,男,1981年生,安徽舒城人,博士,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经部·书类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0页。

② 详见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清人相关辩论文字大多已收入其中。孔祥军对清儒有关《禹贡》考据的论著及思想得失也有比较全面的整理(华林甫主编,孔祥军著:《清儒地理考据研究·先秦卷》,齐鲁书社2015年版);此外近人如陈致远(《〈禹贡〉“九江”地望说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3辑)、魏幼红(《〈禹贡〉“黑水”地望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9期)、潘晟(《宋代的〈禹贡〉之学:从经学传注走向地理学》,《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陈立柱等(《古代“衡山”地望与〈禹贡〉荆州范围综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3辑)、牛敬飞(《太行地望北延考——一种地理知识的思想史考察》,《九州学林》第3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133页)等均从不同角度考察了禹贡山川地望问题。

③ 虽无专门研究,但自清初学者胡渭以至清末杨守敬等皆有所论辩,后文详述。近代以来,顾颉刚、刘起釪等对《禹贡》地名古今变迁有汇释之功,也包含了一些对“大别”地名演变的梳理(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78—780页)。此外顾颉刚《〈禹贡〉中的昆仑》等文章对拙作撰写多有启发。

楚师“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三战”。随后《尚书·禹贡》两次提及：一为“导山”篇，曰“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一为“导水”篇，曰“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但《禹贡》的山川地望并无详述，仅能靠文献前后文及其逻辑关系推断，故有关《禹贡》之地的方位往往歧见纷出，莫衷一是。“大别”的地理知识同样经历近两千年论争，今试对其中脉络做一长时段考察，希望对深化《禹贡》山川地理研究有所助力。

## 一、汉晋“安丰大别”说的发展

先秦文献未见“大别”地望的注释，也未衍生出“大别”地望的假说。检秦汉文献，最早标注“大别”地望的是《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其“六安国·安丰”条有小注“《禹贡》大别山在西南”。按汉代安丰“治今河南固始县东南”<sup>①</sup>，安丰西南即今河南商城、安徽金寨、湖北麻城和罗田一带，班固认为《禹贡》“大别”应位于今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地区。《汉志》代表了汉代对“大别”地望的普遍看法。<sup>②</sup>东汉郑玄注经，言“大别在庐江安丰县”<sup>③</sup>。许慎《说文解字》释“决”字，举例“庐江有决水，出于大别山”<sup>④</sup>，决水即今史河，发源于今大别山北麓豫皖交界的伏牛岭。桑钦《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亦云“大别山在庐江安丰县西南”<sup>⑤</sup>，复云“决水出庐江雩娄县南大别山”<sup>⑥</sup>，按雩娄治“今河南固始县东南、史河西岸”<sup>⑦</sup>。

西晋成书的《续汉书·郡国志》仍持同样说法，“庐江郡”条载“安丰，有大别山”。同时期，京相璠著《春秋土地名》释“大别”为“汉东山名也，在安丰县南”<sup>⑧</sup>。京相氏这条注释结合了山南北两麓的观察视角：山北为政区视角，采纳《汉志》以降的“安丰”说；山南在汉水以东，汉水在此触山回南入江。这对“大别”地望的观察理解更趋全面。

今大别山地区在汉晋时属庐江郡与江夏郡的交界地带，班固、郑玄、司马彪、京相璠等皆认为大别山当在两郡相邻的群山之中。汉晋学者习惯以山北的安丰作为大别山方位的地理参照，或受当时山地南北开发程度及自身观察视角影响。

两汉时期，今大别山主体在庐江郡境内。北麓近山地带多平原地貌，邻近中原，开发较早，已陆续设置了蓼、安丰、雩娄、灊、龙舒等县。南麓为蛮人所居，开发较晚，长时间无一邑之置。又，

<sup>①</sup> 周振鹤编著：《汉书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页。

<sup>②</sup> 按清人疑经，从孔颖达《尚书正义》言“《地理志》无大别”出发，何秋涛《禹贡郑氏略例》认为郑玄所引《地理志》别有所据，并非班固《地理志》，当为郑氏当代之书。魏源《禹贡说》亦疑《汉志》原注“《禹贡》大别山在西南”为唐本以后人取郑注以增入，今人孔祥军《试论清代学者〈禹贡〉研究之总成绩》（《清史研究》2012年第1期）亦从魏氏说。不过，无论郑注取自《汉志》还是别有所据，汉人以“安丰”定“大别”地望的认识是十分明确的。

<sup>③</sup>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六《禹贡第一》，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

<sup>④</sup> [汉]许慎：《说文解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页。

<sup>⑤</sup>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四〇《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55页。

<sup>⑥</sup>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二《蕲水·决水·沘水》，第746页。

<sup>⑦</sup> 钱林书编著：《续汉书郡国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8页。

<sup>⑧</sup>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八《沔水》，第672页。

班固、郑玄、许慎等人皆居于淮水以北，观察视角相近。在大别山北麓诸政区中，以庐江郡安丰县地近，故多以“庐江安丰”描述“大别”地望。

西晋时，杜预在《春秋释例》中对“庐江安丰”说质疑。在解释《左传》“自小别至于大别”条“大别”地望时，杜预没有沿用旧说，而在释文中直接指出“大别，阙”，并进一步推断：“或曰，大别在安丰县西南。《传》曰：吴既与楚夹汉，然后楚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然则二别近汉之名，无缘反在安丰也。”<sup>①</sup>可见，杜预不支持“安丰”说。

杜预对“安丰”说献疑，不但涉及《禹贡》和正史地理志中的山川地望问题，也是从《左传》史事及其他地名考证中生发的经学传注问题。他结合地理常识推断，既然楚将“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则二别近汉，安丰距汉水太远，不合常理，故“大别”不在“安丰”。杜预的《春秋》学在经学领域地位甚高，他虽未指出新的“大别”地望何在，其“未定之词”<sup>②</sup>却动摇了“庐江安丰”说。后世学者再就“大别”地望各抒己见时也多围绕《左传》这段文本加以推演。

东晋初年的《伪孔传》<sup>③</sup>即循此路径进一步演绎。由于释“大别”地望离不开与汉水的关联，《伪孔传》中《禹贡》传文同样融汇《左传》有关记载，称“内方、大别，二山名，在荆州，汉所经”<sup>④</sup>。“大别”范围在空间叙述上开始从扬州向荆州转移。然荆州境内何山可定为《禹贡》“大别”，尚待学者指认。

较早受到杜预影响的地理经典是《水经注》。如《沔水注》释汉水流向，“又南至江夏沙羡县北，南入于江”，清晰反映了郦道元的倾向。该篇依次列举《尚书·禹贡》《左传·定公四年》《春秋土地名》《春秋释地》的相关史料，指出“按《地说》言‘汉水东行，触大别之阪，南与江合’，则与《尚书》、杜预相符，但今不知所在矣”<sup>⑤</sup>。显然，郦道元认可杜预“无缘反在安丰”之说。对于大别山的确切方位，郦氏同样谨慎阙疑。但《水经注》也非一味质疑，“安丰”旧说偶见于注文。如《江水注》释“鄂县北”条，江水过五矶，“左则巴水注之，水出零陵县之下灵山，即大别山也”，又曰巴水“与决水同出一山，故世谓之分水山，亦或曰巴山”<sup>⑥</sup>。这种看似矛盾的注文同见一书，恰是这一时期“大别”地望认知逐渐混乱、不能确指的反映。

## 二、唐代“汉阳大别”说的出现

唐初成书的《隋书·地理志》沿用了汉晋成说，“弋阳郡期思县”条载有“大别山”<sup>⑦</sup>。隋代期思县治今商城县东，即两汉安丰、零陵县旧地。唐初孔颖达奉敕编《五经正义》，其《春秋左传注

<sup>①</sup> [晋]杜预：《春秋释例》卷七《土地名》，《丛书集成初编》第3628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4页。

<sup>②</sup> [清]焦循：《禹贡郑注释》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页。

<sup>③</sup> 《伪孔传》系指伪造的孔安国古文《尚书传》。《尚书》有今文、古文之别，今文为汉初伏生所传，古文为孔安国所传，所书文字不同。永嘉之乱中，《尚书》之学不传。晋室南渡后，豫章内史梅赜进献孔传古文《尚书》，被立于学官。唐孔颖达以之为《尚书正义》的底本。自宋以后，学者多疑其伪，一般认为乃东晋晚出之书，皆称“伪古文”“伪孔传”。该书虽伪，但大致能够反映两晋之际的思想现实。

<sup>④</sup>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六《禹贡第一》，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190页。

<sup>⑤</sup>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八《沔水》，第672页。

<sup>⑥</sup>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五《江水》，第808页。

<sup>⑦</sup> 《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75页。

疏》充分吸收杜预注成果<sup>①</sup>,在唐以降经学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经不断引述,杜预疑不在“安丰”之说演变为“杜氏已知在江夏不在安丰”或“杜注云大别在江夏界”的表述。即便杜预本意如此,汉晋时期江夏郡幅员广袤,横跨汉水下游及整个鄂东南地区,东北部还连接今大别山余脉。因此,杜氏所言“大别”在江夏界的具体位置仍相当模糊。后孔颖达在杜预经义基础上,认为“如(杜)预所言,虽不知其处,要与内方相接,汉水所经,必在荆州界也”<sup>②</sup>。然荆州范围比江夏郡更宽泛,大别山确切位置愈加难定。所以,隋至唐初大别山地望延续了两晋以来旧说见疑、新说未立、不能指实的尴尬状态。

这种情形在中唐时期发生了“戏剧性”转变。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首次提出“大别”在“汉阳”的观点。“沔州·汉阳县”条载:“鲁山,一名大别山,在县东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带汉水,山上有吴将鲁肃神祠。”<sup>③</sup>鲁山即今湖北武汉汉阳龟山,古称“翼际山”。《水经·江水注》载:“江水又东径鲁山南,古翼际山也。《地说》曰:汉与江合于衡北翼际山旁者。”<sup>④</sup>李吉甫提出以鲁山为大别多少有些突兀,中唐以前的文献中并无显著证据表明《禹贡》大别与鲁山有关,此说遂给后人考查失据、论断草率的印象。《元和郡县图志》对重要河湖山岳及州县多有释名,如鲁山得名自“山上有吴将鲁肃神祠”。按此体例,庐江安丰大别骤然移位鲁山,书中当有交代。但《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三》无“汉阳大别”提及,又《淮南道》卷于北宋后佚失,亦难知其中是否有“安丰大别”相关信息,因而不能断定鲁山为大别。

检寻李吉甫之前的材料,李白所作《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序文将“大别山”与沔州汉阳城联系<sup>⑤</sup>,则至迟在盛唐“大别”的确切所在已从此前广袤的荆州、江夏郡收缩至沔州汉阳。尽管不能借此将李白视为最早定“大别”地望在汉阳的人,但说明这一观点在中唐前已然形成。

有关《禹贡》的经学阐释或可弥补杜预与李吉甫之间的证据缺环。按焦循分析,“大别”不在“安丰”之说起疑于杜预,承之于郦道元,但均是“未定之词”。晋隋之际,汉阳鲁山(翼际山)从未披“大别”之名,至《元和郡县图志》以“鲁山”为“大别”,实出杜、郦所料。<sup>⑥</sup>两大假说的文本起源有二:一是源于“导山”篇,从禹贡山系走向中求“大别”;一是源于“导水”篇,从汉水入江处求“大别”。汉水“过三灋,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成为杜预献疑后诸家最主要的文本基点和论证焦点。在经典文本与现实地理的反复比照下,汉阳之鲁山(翼际山)界于江汉之汇,正与经义吻合。以“鲁山”为“大别”不显突兀,反而延续了杜预治经的学术精神,使《春秋释地》的解释更具象。后世对李吉甫的讥议并不允当。

李吉甫首倡“汉阳大别”说,坐实了杜预、孔颖达等人不能确指的江夏说、荆州说,结束了南北朝以降新“大别”地望含混不清的状态。尽管李吉甫“径以鲁山当大别”证据不算充分,但因其人其书的影响“自是后人多宗之”<sup>⑦</sup>,其后千余年仍影响深远。从杜预到李吉甫,经学传注的地理

<sup>①</sup>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四“定公四年”条,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4页。

<sup>②</sup>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六《禹贡第一》,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190页。

<sup>③</sup>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七《江南道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48页。

<sup>④</sup>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五《江水》,第804页。

<sup>⑤</sup>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七九,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829页。

<sup>⑥</sup> [清]焦循:《禹贡郑注释》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55册,第240—241页。

<sup>⑦</sup> 张修桂:《汉水河口段历史演变及其对长江汉口段的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观念演变为沿革地理的知识更新，促使新“大别”说成型。

### 三、宋明“汉阳大别”说的传播

中唐以降，“汉阳”说逐渐取代“安丰”说，千载流播。宋明时期注经家与《左传》《尚书》学者不遗余力地阐释“汉阳”说之合理，批判汉儒“安丰”说之不足，意在为杜预经解、吉甫图志提供更多坚实的文献依据和现实注脚。

#### （一）宋元学者对“汉阳”说的论证

宋代是《禹贡》之学从经学传注向地理学转折的时期。<sup>①</sup> 随着《禹贡》研究深入，大量脱离经义解读但具备宏观地理视野的论著为论证“汉阳大别”说打开了视野。如陈经在《尚书详解》中论天下山川大势，“将一行之山河两戒之说视为《禹贡》山水分区观念的发展，并强调其中的人文界限作用”<sup>②</sup>。在此背景下，《禹贡》山川具备了划分天下人文地理界线的功能。陈经阐释的《禹贡》山川体系中，“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为南条荆山次阳列，“荆山、内方、大别”皆“荆州之山”，“首起嶓冢，大别为尾，其脉相连”<sup>③</sup>。如此，大别山显与扬州的庐江安丰地界无涉了。

两宋经学家还从汉水流向出发为“汉阳大别”说立论。如毛晃《禹贡指南》，在比较《左传》《汉志》《春秋土地名》《水经注》的“大别”古今沿革后，坚信杜预《释地》的观点“与《禹贡》相符”<sup>④</sup>。程大昌以汉水为经，论其“发流之山必名嶓冢，入江之地必近大别”，“大别、小别”为汉水所经绝无疑义，“况下流之谓大别者，今汉阳诚有此山”<sup>⑤</sup>，以之证唐宋“汉阳大别”与先秦“大别”之联系。此外，傅寅<sup>⑥</sup>、程公说<sup>⑦</sup>、蔡沈<sup>⑧</sup>等皆从不同角度论证“汉阳大别说”。

元代《禹贡》学不甚发达，见于史籍的专门之作仅三部且均未传世。<sup>⑨</sup> 元代治《尚书》诸家兼论《禹贡》，如陈栎、陈师凯、朱祖义等皆宗宋学，秉持“汉阳大别”说。

#### （二）明代学者对“汉阳”说的继承和发扬

明代书经家普遍继承宋儒学说。他们或疏导经义加以重述，如马明衡认为《禹贡》“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一脉应为“江北汉南之山一条短支，盖南是江、北是汉，两水夹一山，至大别而尽”<sup>⑩</sup>，并引唐人《史记正义》“汉水经其(大别)左”，指出若大别山“在汉北，则不得云

<sup>①</sup> 潘晨：《宋代的〈禹贡〉之学——从经学传注走向地理学》，《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

<sup>②</sup> 潘晨：《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11页。

<sup>③</sup> [宋]陈经：《尚书详解》卷六“导嶓冢至于荆山”条，《丛书集成初编》第3584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4页。

<sup>④</sup> [宋]毛晃：《禹贡指南》卷三“大别山”条，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7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sup>⑤</sup> [宋]程大昌：《禹贡论》下“三十三·汉”条，《古逸丛书三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页。

<sup>⑥</sup> [宋]傅寅：《禹贡说断》卷三“内方，至于大别”条，《丛书集成初编》第2990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5—96页。

<sup>⑦</sup> [宋]程公说：《春秋分纪》卷三三《疆理书第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1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2页。

<sup>⑧</sup> [宋]蔡沈：《书集传》卷二《夏书》，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

<sup>⑨</sup> 分别是章约斋《禹贡告成书》、郑元瑶《禹治水谱》、于广《禹贡彭蠡说》三部著作。

<sup>⑩</sup> [明]马明衡：《尚书疑义》卷二《夏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6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页。

‘经其左’”<sup>①</sup>。或亲历其地验证，如陈第登临黄鹤楼，认为江对岸“汉阳郡东北，山实名大别，正汉水入江之处”<sup>②</sup>，更笃信杜预等唐宋诸儒所言。或按诸山川走向考其大势，如郝敬释大别山当“在今湖广汉阳府汉阳县，汉水入江处”，与嶓冢、荆山、内方并称“南条四山”，悉归“江汉北境之山”行列。<sup>③</sup>

明代学者在宋元《禹贡》学基础上发扬了“汉阳”说。一方面，蔡沈《禹贡》义理在明初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蔡氏《书集传》受朱熹所托而撰，传朱子之学。明初尊崇程朱理学，胡广等人奉敕以《书集传》为主干，参酌古义撰写《书传大全》，《书集传》遂长期作为科举标准书目之一。经科场年复一年的影响，《书传大全》的“汉阳大别”观念在有明一代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明人对蔡氏之论的考辨、推衍，使明代《禹贡》学“较宋代更为辉煌，见于记载的禹贡学专著达80部”<sup>④</sup>，如郑晓《禹贡图说》、茅瑞徵《禹贡汇疏》、胡瓒《禹贡备遗》等。这些成果不仅绘图显著进步<sup>⑤</sup>，论解也更为充分。又如茅氏《汇疏》，不仅广罗传疏，还提供了丰富的笺释文字，释江汉北境之山为浚汉水之经始，大别“在汉阳郡之北，与黄鹤山夹江而峙，江汉二水合流共下”<sup>⑥</sup>。

### （三）宋明志书的“汉阳大别”书写

宋明地理志书不断阐释、传播“汉阳大别”说。北宋地志仍保留班说，但终以支持“汉阳”说为归。如《太平寰宇记》“汉阳军·汉阳县”条有鲁山、汉水、沔水、滠水，不云有大别山<sup>⑦</sup>；在“安州·汉川县”条小别山复引杜注“汉水至大别南入江，然则此‘二别’在江夏界”，表明乐史虽未明指大别在汉阳，但也认可“二别”在江夏<sup>⑧</sup>。同书“寿州·霍丘县”条在“安丰大别”旧地亦不见“大别”，却出现“安阳山”。据其释名，此山以西属固始、以东属霍丘，原为《汉志》所云“安丰大别”，因汉代“阳泉县在山西北，安丰县在山东北”，今“各取县之一字为名”，即“安阳山”<sup>⑨</sup>。“安丰大别”在文献中时有提及，但已赋新名，说明此时民间地理知识谱系中的“大别”地望已实现转移。<sup>⑩</sup>紧后成书的《舆地广记》虽在“寿州·六安县”条也简记“有《禹贡》大别山”<sup>⑪</sup>，但“汉阳军·汉阳县”条更详称“《禹贡》汉水，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今县盖古大别之地也”<sup>⑫</sup>，较之《寰宇记》更进一步。

<sup>①</sup> [明] 马明衡：《尚书疑义》卷二《夏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64册，第137页。

<sup>②</sup> [明] 陈第：《尚书疏行》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6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56页。

<sup>③</sup> [明] 郝敬：《尚书辨解》卷二《夏书》，崇文书局2022年版，第66页。

<sup>④</sup> 王小红：《宋代〈禹贡〉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03页。

<sup>⑤</sup> 如郑氏《图说》卷首绘制24幅禹贡山水图，其中“导嶓冢”“导江水”等多幅局部图清晰标绘了“大别”位置，位于沔阳州汉阳县、江汉之交。图后注文强调“大别”乃“汉水所入”，与“汉水所出”之嶓冢、“汉水所经”之荆山内方一气贯通，为“导汉之经始”。参见[明]郑晓：《禹贡图说》，《历代禹贡文献集成》第一卷，西安地图出版社2006年版，第417—418页。

<sup>⑥</sup> [明]茅瑞徵：《禹贡汇疏》，《历代禹贡文献集成》第二卷，西安地图出版社2006年版，第669页。

<sup>⑦</sup> [宋]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一《淮南道九》，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585—2586页。

<sup>⑧</sup> [宋]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二《淮南道十》，第2598页。

<sup>⑨</sup> [宋]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九《淮南道七》，第2549页。

<sup>⑩</sup> 在《太平寰宇记》“淮南道·寿州”“光州”诸县的记载中，与“大别”有关史料五条。除上引安阳山条外，两条与决水有关，系引述汉志、汉儒的旧文来证决水源流，不能代表北宋当时的地理情况；一条为固始安阳山，与霍丘安阳山条可相参照；一条为六安县大别山，系对“安丰大别”历史信息的追述。可见宋初“安丰大别”易名“安阳山”是“大别”地望变迁史上的重要一页。参见[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七《淮南道五》、卷一二九《淮南道七》，第2515、2550、2554页。

<sup>⑪</sup> [宋] 欧阳忞撰，李勇先、王小红校注：《舆地广记》卷二一《淮南西路》，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08页。

<sup>⑫</sup> [宋] 欧阳忞撰，李勇先、王小红校注：《舆地广记》卷二八《荆湖北路》，第815页。

南宋地志中“汉阳”说完全占据主导，旧说已无人论及。如《舆地纪胜》“汉阳县”条<sup>①</sup>，于形胜则称“前枕大江，却负大别，汉水出于北与大江合，表里清旷，荆楚之大观也”，于景物则称“鲁山，一名大别山”，于锁钥则称“在大别山之阴”；《方舆胜览》“汉阳军”条亦于山川下称“大别山，在沔阳县东”<sup>②</sup>。相反，“庐州”“寿州”或“安丰军”条下全不见《禹贡》“大别”身影。

明代官方志书进一步强化。如《大明一统志》“汉阳府”条称“大别山，在府城东北汉江右，《禹贡》‘内方至于大别’即此，三国南北之际恒为必争之地，一名翼际山，一名鲁山”<sup>③</sup>。又，《广舆记》记录了很多“汉阳大别”的细节知识，如大别山麓有大禹庙、大别山北汉水与涢水合流入江处为汉口等。<sup>④</sup>

地方志书中的变化也值得注意。在“安丰大别”旧地霍邱，方志中关于大别山的记录简略，民间几乎不知晓旧山名，新山名“安阳山”自北宋至此已被完全接受。<sup>⑤</sup>嘉靖《汉阳府志》对大别山的描述也很丰富，不仅将大别山纳入府县沿革整体叙事，还将由此衍生的地方记忆贯穿始终。经此书写，大别山已然是汉阳府首屈一指的自然胜迹和文化镇山<sup>⑥</sup>，并首次绘入志书卷首疆域图（图1）。该志可视作经学传注转化一般地理知识并为地方社会接受的实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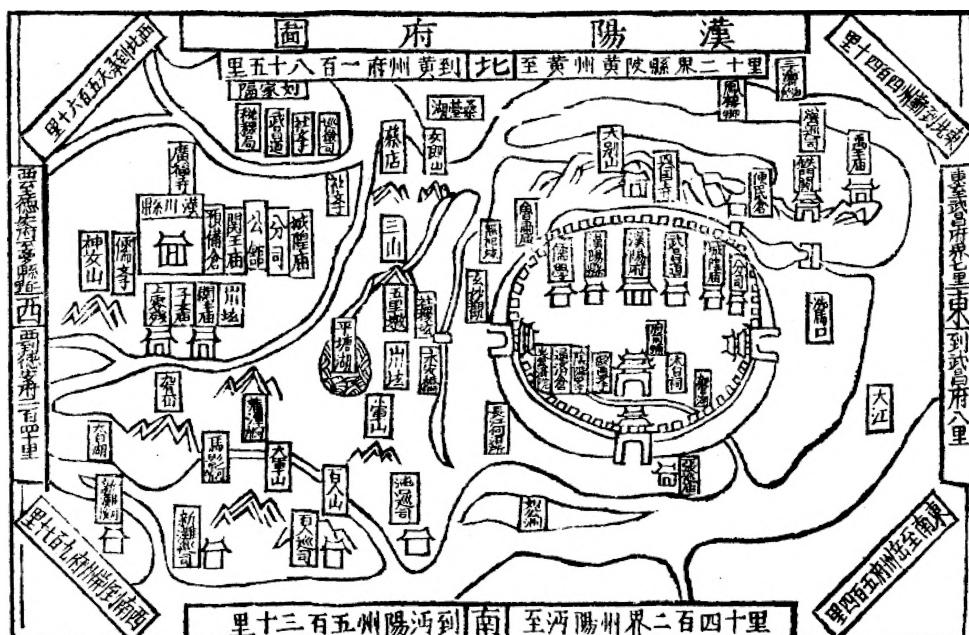


图1 “汉阳府图”中的大别山方位

资料来源：嘉靖《汉阳府志》卷首，明嘉靖二十五年刻本。

①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七九《荆湖北路》，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80—2583页。

② [宋]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二七《湖北路》，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90页。

③ [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司》，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910页。

④ [明]陆应阳辑：《广舆记》卷一四《湖广》，清康熙刻本。

⑤ 成化《中都志》卷二《山川》，明弘治刻本。

⑥ 嘉靖《汉阳府志》卷一《府县沿革志》，明嘉靖刻本，第1—2页。

#### (四) 宋明文人及工具书对“汉阳大别”说的传播

宋明时期，“汉阳大别”的地理认知还经文人墨客的诗赋作品接受和扩散。遍检唐人诗文，吟咏大别者寥寥<sup>①</sup>，至宋代则数量猛增。王象之《舆地纪胜》辑录的咏汉阳诗赋超过半数与大别山有关，其中不乏苏轼、潘大临、王得臣等名家。<sup>②</sup> 又如《方舆胜览》“汉阳军”条甚至将大别山写入赞文。<sup>③</sup>

唐宋以降，汉阳居南北通衢、东西要冲，江汉之交的鲁山被认作大别山，迁客骚人登临此地，怀古凭吊。元代湖广行省治所设在武昌路，“汉阳大别”位列省治诸山名胜之首。泰定三年（1326）湖广主考官以“大别山”为乡试考题，《历代赋汇》收录了三篇《大别山赋》，侧面反映元代对“汉阳大别”认可与接受。<sup>④</sup> 明代文学作品中“汉阳大别”意象同样浓烈。<sup>⑤</sup> 明汉阳府、武昌府地方的人文景观书写中，大别山作为“可以供吾啸咏于无穷”之“三楚大观”<sup>⑥</sup>，与汉水、大江、黄鹤楼、晴川阁等江汉地标融为一体，在文人笔下自然生发。

“汉阳大别”地望还从学界、官方、民间流散至类书、辞书、字书等工具书。如私撰类书《山堂肆考》中“大别小别”条云：“大别山，在湖广汉阳府城东北，汉江之右。《禹贡》‘内方至于大别’，即此。三国南北之际，常为必争之地。一名翼际山，一名鲁山，以山有鲁肃祠故名。小别山，在汉阳府汉川县南，山形如甑，亦名甑山。《左传》‘吴与楚战，济汉而阵，自小别至于大别’，即此。”<sup>⑦</sup> 这对杜、郦以来的各家观点做了总结。又如《天中记》所辑大禹植柏之处即汉阳县大别山<sup>⑧</sup>；《图书编》著录湖广各郡名山，汉阳府“山曰大别”在“城东北，即《禹贡》所载”<sup>⑨</sup>；《正字通》有专门词条释“别”，“大别，山名，按《禹贡》‘大别’，注近汉之山，今汉阳县北大别山是也”<sup>⑩</sup>。

梳理经学注疏、地理志书、诗词歌赋和字书类书等可见，“汉阳大别”说经唐人提出，历宋元数百年论证、推衍与传播，元明时已被普遍接受。“安丰大别”说在唐至明近千年里日渐式微，淡出各类文献。

### 四、清前中期两“大别”说激辩

无论长于考据的清儒还是尊古崇汉、注重经义原说的乾嘉诸儒治学，《禹贡》研究都堪称专门之学。据统计，清儒有关《禹贡》学的著作达 80 多种。<sup>⑪</sup> 在此情形下，唐宋往后的“汉阳大别”

<sup>①</sup> 唯前揭李白《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并序)》、贾至《沔州秋兴亭记》等几首有所涉及。

<sup>②</sup>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七九《荆湖北路》，第 2591—2596 页。

<sup>③</sup> [宋]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二七《湖北路》，第 491 页。

<sup>④</sup> [清]陈元龙编：《历代赋汇》卷二〇《地理》，凤凰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4 页。

<sup>⑤</sup> 参见[明]曹学佺选辑：《石仓历代诗选》卷一五九《题汉阳招真亭》、卷二五九《大别山柏树》、卷三三六《江上秋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刘三吾：《刘三吾集》卷一一《黄密庵墓表》，岳麓书社 2013 年版等。

<sup>⑥</sup> [明]屈大均：《大别山记》，《翁山文外》卷一《记》，清康熙刻本，第 58 页。

<sup>⑦</sup>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八《地理》，《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 97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91 页。

<sup>⑧</sup> [明]陈耀文：《天中记》卷五一《柏》，广陵书社 2007 年版，第 1683 页。

<sup>⑨</sup> [明]章潢：《图书编》卷六三《湖广各郡名山》，《四库类书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53 页。

<sup>⑩</sup> [明]张自烈编，[清]廖文英补：《正字通》子集下“刀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6 年版，第 167 页。

<sup>⑪</sup> 孔祥军：《试论清代学者〈禹贡〉研究之总成绩》，《清史研究》2012 年第 1 期。

说受到质疑，班、郑所持“安丰大别”说经千载沉寂重回公众视野。两派围绕“大别”地望又展开了两百余年的论争。

### （一）清初学者对“汉阳”说的汇释

胡渭《禹贡锥指》是清初《禹贡》学集大成之作。书中对《禹贡》山水地名及其关联郡县考订甚勤；对于孔安国《尚书传》及《汉书·地理志》中所举郡县山水名称也“揆之经旨，准之地望，参之《水经》，验之方志”<sup>①</sup>。前人观点如“安丰之大别非江、汉之所会”<sup>②</sup>，胡渭常称“不敢苟同，亦不敢好异”并重加辨析。对于“内方，至于大别”条有关大别山的经解、诠注，他也详加按语、汇释。

胡渭举述《伪孔传》《春秋释例》《尚书正义》《书集传》等著中主要论点，如“《地理志》六安国安丰县下云：‘禹贡大别山在西南’，郑、杜说所自出。《正义》谓《志》无大别，何也？安丰后汉属庐江郡，其故城在今江南庐州府霍山县西北。……汉阳县即今汉阳府治，大别山在其东北，《水经注》所谓翼际山也”<sup>③</sup>，以明确“汉阳”与“大别”关联。由《左传》吴楚之战的军事地理出发，他又汇集《水经注》《地说》《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等的观点，归纳“汉阳大别”的流变，所谓“《禹贡》大别山，杜元凯已知在江夏，不在安丰。郦氏亦主杜说，而终不能指鲁山为大别。至唐人始能言之”<sup>④</sup>。可见胡渭力申杜预之言、崇尚吉甫之义，赞同“汉阳大别”说。胡氏汇释多承宋明旧说成论，但他将东汉以降各家有关“大别”地望的诠注及涉经史子集各部之言悉加采撷排列，搜罗之全、检讨之细远超前贤，并定“大别”地望当考江汉所汇地理形势的基本结论。“汉阳大别”说千年纷繁的演绎立论过程和学术理路由此明晰。之后持此说的各路学者在考辨路径及文献取材上皆难超《禹贡锥指》。

胡渭所创东樵学派为“汉阳大别”说做了很多汇释。康熙二十七年（1688），曾奉敕纂修《大清一统志》的徐乾学请假归里，康熙帝准以书局自随。回乡后，徐氏在苏州洞庭东山继续编修活动，延聘顾祖禹、阎若璩、胡渭、黄仪等参与编校。胡渭借机“得纵观天下郡国之书”撰成《禹贡锥指》。<sup>⑤</sup> 在“大别”地望问题上该群体观点近乎一致，这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sup>⑥</sup>、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sup>⑦</sup>等均可得见。《大清一统志》则提炼为“考《禹贡》大别，当汉水入江之处，在湖北汉阳县”<sup>⑧</sup>。可见“汉水入江之处”是清初《禹贡》学判断“大别”方位的关键，汉阳鲁山因其方位形势最合乎现实地理与经义注疏，被视为《禹贡》“大别”的最佳地望。

### （二）乾嘉学人对“安丰”说的发覆

中唐至清初，“汉阳大别”一说已成学界主流。直到乾嘉时期“汉阳”说始受怀疑、检视甚至反对，而“安丰”说经由学者深入稽考，重回学界视野。

王鸣盛是较早坚定反驳“汉阳”说、重拾“安丰”说的乾嘉学人之一。王氏专注诠释和发扬东

<sup>①②</sup> [清]胡渭著，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禹贡锥指略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sup>③④</sup> [清]胡渭著，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卷一一下“内方至于大别”条，第373—374页。

<sup>⑤</sup> [清]钱大昕：《胡先生渭传》，《潜研堂文集》卷三八，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九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43页。

<sup>⑥</sup>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一《南直三》、卷七五《湖广一》、卷七六《湖广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031、3498、3546页。

<sup>⑦</sup> [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42—843页。

<sup>⑧</sup> 康熙《大清一统志》卷六五《江南·颍州府》，乾隆八年刻本，第5页。

汉郑玄“一家之学”，从经学史层面对“汉阳大别”条分缕析、详加驳正，是“大别”地望认知演变史上的又一转折。如“内方，至于大别”条，王氏辨析郑注“大别在庐江安丰县”道：“（汉）安丰故城在今江南六安州霍山县西北”，又“班固、郑玄、司马彪及《水经》四十卷，皆以大别系安丰。杜预定公四年《传》注，虽疑大别不当在安丰，然亦不能言其处”。再从史源角度指出《水经注》《地说》《地理志》等所称江汉合于衡北翼际山或鲁山，皆“未尝指为《禹贡》之大别山”，唯《元和郡县图志》“臆度在此，并无所据，而相沿至今”，因此“当以郑注为正说”<sup>①</sup>。

又有“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条，王氏首先就《左传》“自小别至于大别”的地理做出与孔颖达疏相反的推证：

自豫章与楚夹汉，谓吴军汉东，楚军汉西也。子常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言其师众为长陈，自西及东若此之远。两军合战，则自大别以东。寻传文，无从小别与吴战，退而至大别之事也。小别当在大别之西，孔说正相反。安丰故城在今霍山县西，雩娄在安丰之南，大别又在雩娄之南。则英山、麻城、罗田诸县，山势连延，西南趋江汉水东北迤行，插入其境，故曰“至于大别”。盖此山实在汉水之东，观子常济汉而陈，则已明明在汉东矣。而其下曰“自小别至于大别”，大别非汉东乎？今之所谓大别，实在汉水西岸，岂可通乎？

接着，他又对《地说》言“汉水触大别之陂”作了阐发，称：

陂者山脉之靡迤而不尽者耳，触者仅渐及之而已耳，非水直至山下也。传云“触山回，南入江”，回者，回转而后南入耳，非才至山已入江也。玩经两言东，不言南，直至大别之下，方用一南字，何等着力，明系汉水直抵东北，始回转而南。若以今汉口西岸晴川阁畔瞰江之山，与南岸黄鹤楼相对者为大别，则南字便为赘疣。

因此，杜预以“去汉太远”为由疑安丰无大别，曲解了“触大别之陂”本义。实则“大别之在安丰明矣”<sup>②</sup>。王鸣盛破“汉阳”旧说、立“安丰”新论，重新认定“大别”所在，其立场明确无疑。

王鸣盛首为大别地望“翻案”，乾嘉往后相关商榷不断涌现<sup>③</sup>，有些直接转引并支持王氏<sup>④</sup>，有些进一步扩充证据深入探究。其中当属洪亮吉最具代表性。

洪亮吉曾作《释大别山一篇寄邵编修晋涵》，开宗明义：“今俗以汉水入江左侧之山为大别山，始见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余每不为然，今细核之，益知无据。”<sup>⑤</sup>随后胪列十四条证据，否定汉阳鲁山为《禹贡》“大别”。略言之，大别在安丰南，“《春秋土地》，京相有其明征；《禹贡》山川，汉儒均无别义”，此一证也。“自道元注《经》以迄君卿作《典》，只标鲁翼之名，无有别山之号”，此二证也。杜预“止云然则二别在江夏界，姑设疑词以启来惑，而究不能定指一山，夺兹旧义”，此

① [清]王鸣盛著，顾宝田、刘连朋校点：《尚书后案》卷三《虞夏书·禹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182页。

② [清]王鸣盛著，顾宝田、刘连朋校点：《尚书后案》卷三《虞夏书·禹贡》，第203—204页。

③ 这一时期，主班、郑之说的学者中很多都是当时名家，如孙星衍、焦循、洪亮吉、胡承珙、张聪咸、丁晏、汪世铎、成蓉镜、黄彭年等人。

④ 如嘉道间遍注群经的经学家陈乔枞，其《今文尚书经说考》于“大别”条就完全采信并征引王鸣盛的相关注释。焦循也明确支持王鸣盛，在《禹贡郑注释》一篇中他说：“王光禄《后案》辨明大别在汉水之东，凡霍山以西，英山、麻城、罗田诸县山势连延，汉水东北插入其境，其言甚辩，余为申之”。并且还为王氏补充考证汉水“至于大别南入于江”，理据甚明，思维缜密，很有见地。

⑤ [清]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第七《释大别山一篇寄邵编修晋涵》，[清]洪亮吉撰，刘德权点校：《洪亮吉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64页。

三证也。道元引《地说》“一则云翼际之山，一则云大别之坂，各标一号，明系二山”，此四证也。考《左传》“定公四年”吴楚二师行军路线，“推此则大别、小别皆淮南、汉北之山”，此五证也。行军途中时有转战，“则道里不常”，不可以“去汉较远”而疑战场所在，此六证也。以柏举之地推求大别、小别之所在，则柏举在今麻城县，此七证也。考清发方位在安陆县，此八证也。考雍澨地理，盖“《禹贡》导水由西而东，故先言三澨，而后及大别。吴师入郢，则自东及西，故既至大别，乃及雍澨”，此九证也。杜预“得之于柏举、豫章，而失之于大别、小别”，则“求豫章所在，而二别益可推”，此十证也。考息“即今光州息县”，由“左司马戍及息而还”，则“大别山又近息可知”，此十一证也。由“子常济汉击之，正出吴师之前；司马自息取道至淮汭，则出吴师之后”亦可知大别在淮汉之间，此十二证也。以今汉川县甑山自吉甫始强名小别，反证鲁山强名大别，“可知非实”，此十三证也。由“小别之疑，并识今内方之妄”，此十四证也。<sup>①</sup>

洪氏就“汉阳大别”说多角度批驳了唐宋各家的臆断与不足凭，所列证据构成了比较严密的证据链，改变了以往“安丰大别”说仅靠几条材料反复陈述的无力局面，夯实了汉儒有关“安丰大别”说的立论根基，“史料充实，逻辑严密，令人信服”<sup>②</sup>，可谓乾嘉时论“安丰大别”者最系统完备的作品。

此后，“大别”地望之争在乾嘉道咸学人间渐成显学。如张聪咸尝辨《左传》定公四年杜注<sup>③</sup>、丁晏曾撰《禹贡锥指正误》等，从成文数量与学者规模来看，清代《禹贡》学内部已形成一股质疑“汉阳”说、重建“安丰”说的思潮。“安丰大别”说经过持续辩论和反复推演，学理愈加清晰，热度不断提升。

### （三）咸同时期“汉阳大别”论者的应战

面对两派论战，一些调和论者摒弃“非此即彼”的框架，提出新说转移焦点、平息争议：第一种是“两处大别”说，以高士奇、钱坫为代表<sup>④</sup>；第二种是“大别陪尾互易”说，以姚鼐为代表<sup>⑤</sup>；第三种是“汉东天门大别”说，以魏源为代表<sup>⑥</sup>。上述调和论者的加入实际并未说服原有争执的任何一边。相反，“汉阳”“安丰”两说各持一端，继续争论。

在王鸣盛、洪亮吉等人重定“安丰”说获得广泛支持的同时，“汉阳大别”论者也在积极应对。如罗汝怀《洪氏释大别山辨》采用“原文对勘”的方式对照洪氏十四条证据逐条辨析，称洪氏以《左传》之舆地所释既非《禹贡》之大别，亦与《左传》之大别无关，坚持认为“《禹贡》大别山在今汉阳江滨，无可移易”<sup>⑦</sup>，捍卫宋明旧说。

除了辩论性文章，“汉阳”论者还编修专门志书应对“安丰”说攻势。同治十三年（1874），胡凤丹在湖北道任上编纂成十卷《大别山志》。面对各种异说泛起，胡凤丹疾呼为“汉阳大别”再正名并搜讨群籍，举凡有关“大别”者悉采收录。该志卷首附图，以大别山为首，另晴川、月湖等各

<sup>①</sup> [清]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七《释大别山一篇寄邵编修晋涵》，[清]洪亮吉撰，刘德权点校：《洪亮吉集》，第164—168页。

<sup>②</sup> 张修桂：《汉水河口段历史演变及其对长江汉口段的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sup>③</sup> [清]张聪咸：《左传杜注辨证》卷六，刘世珩辑：《聚学轩丛书》第2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2年版，第3—6页。

<sup>④</sup> [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1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sup>⑤</sup> [清]姚鼐：《陪尾说》，《惜抱轩九经说》卷三《尚书说·一》，清同治刻本，第15页。

<sup>⑥</sup> [清]魏源：《书古微》卷四《释道山南条阳列》，《魏源全集》第2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77—78页。

<sup>⑦</sup> [清]罗汝怀：《绿漪草堂文集》卷一一《辨议》，《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附一图；随后爰稽掌故，并讨群经，追源溯流，兼揽词赋，成《名胜志》二卷、《仙释、金石志》一卷、《艺文志》五卷。其中《艺文志》又别为赋、释、考、辨、记、铭、碑文、书、跋、诔、诗词等体裁，汉唐以降与鲁山、大别相关之胜迹典故皆得汇辑。

《大别山志》的内容体例颇能体现编纂意图。该志汇各家论“大别”在汉阳的经义考据文字于一编(卷一“大别山六十则及案二则”)；再将汉阳名胜悉数罗列，标示了汉阳与大别的紧密联系。《大别山志》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展现了《禹贡》“大别”的名山形象，巩固了“汉阳大别”说的受众与影响。

## 五、清末“安丰大别”说的回归

### (一)《水经注》纂疏对“安丰”说的接受

在两个“大别”地望争议中，《水经注》是重要的文本起点和结点。相比精炼的《禹贡》《汉志》，《水经注》中关于大别山和汉水的注解材料可谓丰厚。“汉阳大别”或“安丰大别”说的支持者都冀望从中发掘更多有利证据。又因《水经注》传世版本存在经注混淆等舛误，能在整理过程中掌握史料解释权的诸儒在《禹贡》山川聚讼中显然更具优势。禹贡学与郦学作为清代史地研究的两大显学，催生了许多学术成果。“安丰大别”说的最终回归以及“大别”地望之争的消解离不开以上前提。

清代转绘《水经注》图的代有其人。其中，光绪间湖北杨守敬及其弟子熊会贞所绘《水经注图》以胡林翼刊印《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朱墨两色套印古今地名。成图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对《水经注疏》佐证资料的利用。杨氏师徒编撰《水经注疏》关于“大别”的注疏按语，则折射了注者对“安丰大别”说的接受与支持态度。相关疏文谨录两段如下：

“决水” 守敬按：大别亦见《江水注》巴水下，曰下灵山，曰分水山，曰巴山，皆异名也。……观《水经》及《注》，决水、巴水各出大别，则指今商城、罗田之间言，决水出商城东南，巴水出罗田东北也。大别非汉阳之鲁山，洪亮吉曾设十二难以辨之。<sup>①</sup>

“江水三” 江水又东径鲁山南……守敬按：《寰宇记》引刘澄之《永初山水记》，沔阳县东有鲁山。《舆地纪胜》引史本《新经》云：上有鲁肃祠。在三代时，谓之大别山，不知因何又名鲁山也。岂鲁肃庙食于此而名是山歟？考大别在汉东，鲁山则在汉西，古无大别之名，自李吉甫言一名大别，而后人咸从其说。洪亮吉曾立十三证以辨之。在今汉阳县东北百步，俗名龟山。古翼际山也……《地说》曰：汉与江合于衡北翼际山旁者也。守敬按：衡山见《湘水》篇，去翼际山甚远，此称衡北，盖举其大者为说也。<sup>②</sup>

可见杨氏疏文对“大别”地望的理解已明确放弃“汉阳之鲁山”而回归“庐江之安丰”论。他们在编绘巴水、蕲水、决水、沘水图时也将“大别”落实在相应区域。汉阳之山在图中则被标注为“鲁山，古翼际山”。

<sup>①</sup> [北魏] 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三二《决水》，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660 页。按：“十二难”实为十四证。

<sup>②</sup> [北魏] 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三五《江水三》，第 2895 页。



图2 《禹贡山水泽地所在》图中标注的大别山方位

资料来源：杨守敬、熊会贞编绘《水经注图》，中华书局2009年版。

地方志中也有相应例证。如光绪《光州志》有对“大别山”的书写和标绘，而民国初年《湖北通志》中却找不到汉阳“大别山”的身影。乾嘉以降的百余年间，经过学者不遗余力地考辨、阐释及宣介，“安丰大别”说逐渐重归主流。

## (二) “汉阳大别”代之以“龟山”之名

清末民初，两个“大别”的境遇显著改变。一方面，为“汉阳”说再正名的《大别山志》未达预期。伴随传统经学的近代转型，“汉阳大别”之名虽在一些著述、地方史志中仍有沿用，但已逐渐被新名“龟山”替代。成书于嘉道之际的《方舆考证》叙湖北名山时已在汉阳“大别”条后加注释文：“今谓之龟山。”<sup>①</sup>至清末，汉阳大别山的俗名“龟山”已被官方文书和报刊媒体广泛提及，使用频率大增，成为正式名称。<sup>②</sup>在乾嘉学者的持续辩驳之下，民间认知率先与学术经典疏离，最终“龟山”代“大别”成为主流。另一方面，以王鸣盛、洪亮吉、焦循为代表的经史考据家群体努力为“安丰大别”说正名，并得到各界重视。尽管始终面对“汉阳”说的坚守反击，又有各种新说不断掺入，“安丰大别”说的经学面貌与地理形象比之汉晋时期更加饱满清晰。

## 六、结语

大别地望千年纷争史的本质，实为记录者观察视角与个体理解的差异，并无对错之分。汉晋学者立足点不同，导致后世诸多论争。汉代学者多在六安国、淮南国、衡山国等山北地区观“大

① [清]许鸿磐:《方舆考证》卷五七《湖北一·名山》,济宁潘氏华鉴阁本1933年版,第2—3页。

<sup>②</sup> “龟蛇锁大江”是现代人习知的武汉地理形胜，由汉阳之龟山（旧名“大别山”）和武昌之蛇山（旧名“黄鹄山”）所构成。

别”地望，乃生“安丰”说；晋代学者，如杜预的主要经学作品因成于荆州任上，其观“大别”地望必自山南视角，乃生“汉阳”说。此皆主观因素。

从客观层面看，千年“大别”地望之争虽牵涉众多、论辩激烈、观点庞杂，但论者始终坚持以汉水入江之地而求“大别”，始终没有跳开经典，围绕《禹贡》导山导水及《左传·定公四年》吴楚之战的文本，穷尽一切可能史料推演论证，提出观点和根据。作为重要的儒家经典，《尚书》《左传》的一切都可归为经学范畴。杜预治《春秋》经传，是经学史上的关键人物，也是两“大别”说肇启者。围绕吴楚之战楚将子常“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的军事地理，杜预考“二别”所在，生汉东、汉西方位之异，即后世之“安丰”“汉阳”两说的滥觞。在新“大别”地望由虚指实的过程中，围绕《禹贡》“导水”篇言汉水“至于大别，南入于江”，经学家、考据家做了大量传注诠释，并参照现实地理，定“大别”于江汉汇合处之汉阳。

可以说，“汉阳大别”说的确立是历代学者对经典接续阐释的结果。同样地，“安丰大别”说回归亦是基于考据家对经典的再审视、再解读。清儒批驳“汉阳”说、重建“安丰”说的立论基础仍是《禹贡》及《左传》文本。在很长一段时期，经学传疏都是新地望知识的生产者，地志舆图、诗词歌赋、辞书类书只是这一地理知识的使用者。自杜预献疑，新说便开始在沿革地理中发酵，从《水经注》之虚到《元和郡县图志》之实，再到宋明时期的广泛传播，经学注疏逐渐转化为一般性地理知识。在近代以前，地理志书与经学传注之间的信息互动及其调整适应一直持续，《禹贡》“大别”地望变迁的知识史研究是考察其过程的一个长时段例证。

## A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Dispute over the Location of ‘Dabie’ in *Yugong*

..... Shen Zhifu ( 23 )

( School of Humanities,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011, China)

**Abstract:** The debate over the location of ‘Dabie’ (大别) recorded in *Yugong* (《禹贡》) has persisted for nearly two millennia, with the most intense disputes emergi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wo mainstream viewpoints crystallized: the ‘Hanyang’ theory and the ‘Anfeng’ theory. These interpretations first appeared during Han and Tang Dynasties, initially documented in *Hanshu Dilizhi* (《汉书·地理志》) and *Yuanhe Junxian Tuzhi* (《元和郡县图志》), respectively. During Han and Jin periods, the ‘Anfeng’ theory was widely accepted. Betwee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doubts raised by scholars such as Du Yu and Li Daoyuan in their commentaries on classical texts gradually led to diverging opinions. By Tang Dynasty, Li Jifu (李吉甫) formally proposed the ‘Hanyang’ theory. Subsequently, during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increasing numbers of scholars endorsed the ‘Hanyang’ theory, which gradually supplanted the older ‘Anfeng’ theory. Finally, in Qing Dynasty, different academic schools reignited a fierce debate over the location of ‘Dabie’. In summary, the shifts in the dispute over the location of ‘Dabie’ since medieval times reflect not only differences in the perspectives of writers and their source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but also the interplay and adaptation between geographical records and classical commentaries.

**Keywords:** *Yugong*; Dabie; dispute over the location; Anfeng; Hanyang

---

## Supplements and Revisions to the Research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Evolution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n Liu Song Dynasty ..... Yao Le ( 37 )

( Jiangsu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210004, China)

**Abstract:** By further analyzing materials o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from official historical records and ancient geographical chronicles, this study makes several supplements and revisions to existing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evolution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during the Liu Song Dynasty. First, it supplements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that should have been included but were omitted from the *Treatise on Geography* of the *Book of Song* (《宋书·州郡志》), including Jianning Left Commandery (建宁左郡), Guangxi Commandery (广熙郡), as well as Heyuan (河源), Guangning (广宁), Gaoxing (高兴), and Liaoshi (背石) Counties. Second, it revises and supplements details regarding the evolution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ncluding changes in the affiliations of Yiyang Commandery (义阳郡) and Song'an Left Commandery (宋安左郡), as well as the duration of existence of Nanling (南陵), Xinling (信陵), Pingle (平乐), and Haihun (海昏) Counties. Third, it examines the locations of administrative seats or geographical positions of certain divisions, involving Donghai (东海) and Yongning (永宁) Commanderies, as well as Changning (长宁), Shanghuang (上黄), Shichang (始昌), Chunling (初宁), Xi'an (熙安), and Liaoshi Counties.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seat locations of Qijian Commandery (齐建郡) during the Southern Qi Dynasty and Changlin (长林) and Zhangshan (章山) Counties during the Sui Dynasty, which may correct inaccuracies in the relevant maps of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Keywords:** Liu Song Dynasty; *Treatise on Geography* of the *Book of Song*; omitted commanderies and counties; evolution; administrative seat

---